

世界最大鞋廠罷工 中國民工社保困局

世界最大的鞋廠、台資裕元集團在廣東東莞的廠房爆發工潮，總數逾四萬的員工不滿資方少繳社保費，影響他們退休後的生計，透過QQ、微信等途徑動員罷工。資方回應指將會補繳，但對於補繳額度和覆蓋的時間，需待政府出台新規定才能確定。事件暴露社保政策的漏洞，以及政府監管不周，折射農民工社保困局。隨著網絡及手機的普及，勞工維權意識增強。

劉項、朱永瀟、馬倩



■ 大批警察在裕元廠房戒備：防範



■ 東莞裕元廠的罷工員工：維權

樣感到無奈，雖然社保單上寫的企業繳納數字是零，但是廠方表示，廠方從來沒有偷逃社保金，社會保險明細單上顯示「零」是「誤會」，裕元工業行政中心副協理李路加說，「社保是雙方共同繳納的，工人交了社保，企業不可能沒有交」。

來自湖南的趙紅（化名）在裕元廠工作了十年，她向亞洲週刊記者展示了她的「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對賬單」，這張對賬單來自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，詳細記錄了她近十年社保的繳納狀況，從零六年到一四年，「個人繳費」一欄一直有著數百至一千的金額，這些金額每月按比例從趙的賬戶裏扣除，但是在「單位劃入」這一欄，卻沒有相應金額，一排表格裏面，一個個金額都是「零」。

接著，趙紅又拿出了一張名為「參保人險種繳費明細表」的表格，同樣來自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，但是在這張表格上，無論是「個人繳費」還是「單位繳費」欄上，都寫有繳費金額，同樣的項目，在此表格上有金額，在前表中卻沒有。

裕元鞋廠在公告稱企業漏繳社保是「誤會」，而東莞市社會保障局高埗分局對裕元的相關問詢做了書面回覆，回覆稱「對賬單」，也就是顯示企業繳納社保金為零的單子，反映的只是「個人繳費部分明細」；而顯示企業個人均有繳費的「明細表」反映的才是「單位和個人的繳費明細」。

工人與企業各執一詞的狀況，還不止於此。趙紅說，她參加工作的時間是二零零四年，至今已在裕元鞋廠工作了十年，但在用工形式這一欄，寫的卻是「臨時工」，這張打印出來的表格下方，還印有「溫馨提示」，「以上是我局信息系統為您記錄的參保繳費信息，將直接影響您的基本養老金的核定結果，特別是工作日期、用工形式……」

「我們工作了這麼多年，怎麼還是臨時工，我們是簽過用工合同的」，趙紅展示了她那本已經略微泛黃的用工合同，合同上寫著她的職稱是「工人」，簽署的是「無固定期限合同」。

資方回應指屬誤解

「我們工作了這麼多年，怎麼還是臨時工，我們是簽過用工合同的」，趙紅展示了她那本已經略微泛黃的用工合同，合同上寫著她的職稱是「工人」，簽署的是「無固定期限合同」。

「我們工作了這麼多年，怎麼還是臨時工，我們是簽過用工合同的」，趙紅展示了她那本已經略微泛黃的用工合同，合同上寫著她的職稱是「工人」，簽署的是「無固定期限合同」。

廣東東莞是台商的主要集中地，台資的世界最大鞋廠裕元的其中一家廠房就設在東莞，這間有約四萬員工的鞋廠，四月份爆發大罷工，工人透過微信、QQ等方式號召維權，逼使資方出面應對，也暴露了政府相關政策及監管的漏洞。

下午五點鐘，已經是下班時間，東莞裕元鞋廠主廠區周圍卻都是走向工廠的人群，他們從自己的宿舍或租住的房子走出來，拿著員工證，秩序井然的走進工廠大門，進入廠房，在考動機上打卡，然後立刻離開，數萬人的人流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裏，一來一去。他們是東莞裕元鞋廠罷工中的工人，每天上班時刻，他們前來打卡，然後離開，到了下班時刻，他們又來打卡，接著離開，從四月十四日大規模開始的罷工，至今還沒有停息的跡象。

引發罷工的，是企業社會保障金的「漏繳」問題，裕元鞋廠沒有為員工繳納足夠社會保

裕元小檔案

台資鞋廠，為全球各大品牌運動鞋代工，母公司是台灣寶成集團，由蔡氏家族於1988年創辦，為香港上市公司。其廠房分布在中國廣東東莞、中山、珠海、江西吉安、印尼、越南等，員工總數逾四十萬，中國廠房員工約十六萬。裕元的客戶包括 Nike、Adidas、Reebok、Converse、New Balance、Timberland、Puma 及 Asics 等品牌。2013 年度裕元營業額為 75.8 億美元，盈利為 4.35 億美元，總共生產了 3.13 億雙鞋子。

楊薇之所以看重這社會保障金，是因為這筆錢關乎她的養老。按照法律規定，企業和僱員都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繳社會保障金，十五年便期滿，這樣等員工達到退休年齡之後，便能獲得一定金額的退休金用於養老。根據東莞地方社保法規，養老金的金額將由上繳社保費用的多寡決定。從二零零零年開始實行的社保制度，現在到了第一批工人領取養老金的時候，相關問題也隨之而來。

四月初開始罷工的廣東東莞裕元鞋廠的員工，很多都和楊薇有著類似的打算，擔心自己的未來，因此出來抗議。而裕元管理層則同

「純屬誤解」。東莞社保局高塘分局回應裕元的問詢指出，「用工形式只是參保記錄中的一項記錄，與繳費多少和社會保險待遇無關」。裕元工業行政中心副協理李路加對亞洲週刊表示，政府只將國企職工列為「一般職工」，而私企企業無論層級高低，都會在這裏被列為「臨時工」。

不過，即使裕元鞋廠已經繳納了社保金，它繳納的社保金基點並沒達到員工的實際工資水平（人民幣三千元左右，約四百八十美元），趙紅出示的文件顯示，在二零一三年七月至一四年九月的繳費基點是一千八百一十元，企業為員工繳納的保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一，以此計算，裕元在這個時間段每月為員工繳納的社保金金額是一百九十九元，但是若按照工人實際收入的水平繳納社保金，裕元鞋廠每個月要為工人繳納的社保金則是三百三十元，相差一百三十元，而隨著繳費基點的提升，工人工資的上漲以及繳



未罷工時的裕元廠房：產品銷往全球



罷工後的裕元生產線：空蕩蕩

費比例的變化，這個差距還將越來越大。李路加表示，社保繳費金額很難以工人實際收入作為繳費基點，這只能是一種「理想的狀況」，在進入東莞多年以來，裕元鞋廠繳納的保的基點都是自己設定的，在早期繳費基點是社會最低工資，近年來繳費的基點變為社會平均工資，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法規規定繳費基點，也沒有直接的命令指

示。

在社保繳納問題上，政府與企業形成了某種「默契」，政府沒有給裕元硬性規定社保繳費基點，看重的更多是社保的覆蓋率。裕元鞋廠在最新的通知中，決定同意對社會保障金進行補繳，但是對於補繳的額度、覆蓋的時長，卻語焉不詳，李路加和台灣寶成工業（裕元母公司）執行長辦公室副協理莊博貴向亞洲週刊表示，之所以語焉不詳，是因為當地政府還沒有明確的指示，他們現在決定，會完全接受政府將來出台的新

月十四日才會給員工們一個滿意的答覆，工潮得以暫時緩解，楊微當時覺得，「等半個月就再等半個月吧，反正已經等了這麼多年了，也不差這半個月」。為何要等到四月十四號這一天再回應？在為耐克代工的老三廠工作的楊微說，他們在四月初有一批需要空運的訂單，這批訂單若是不能完成，工廠將會支付高昂的違約金，

「如果從今年五月開始交，那之前都算白幹了麼？」楊微質問。「臨時工」、「企業繳社保為零」的消息，讓工人們對工廠，乃至企業的信任瞬間瓦解，工人間流傳的不少謠傳，更加劇了這種不信任。

多名員工向亞洲週刊表示，裕元鞋廠的租約將在二零一五年底到期，屆時整個裕元鞋廠將會遷出東莞，不過裕元鞋廠管理層則表示，廠方暫時沒有遷走的計劃，工廠的用地是裕元已經購買的，不存在租約問題。

員工中還流傳著一則未經證實的傳言：老三廠的台灣管理人員蕭姓協理曾在四月十四號下午一點多站在A B棟的寫字樓大門口，看著眼前一排一排走過的員工說道：你們滾吧滾吧，大陸人賤得很，要錢不要臉。這個事件迅速傳開，也引爆了員工積壓已久的對台籍老板的情緒。「他居然講大陸人不要臉！」直到四月二十一日，事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，進廠打卡的人群中依然有不少員工語帶憤怒談論這起事件。



寶成集團執行長辦公室副協理莊博貴



裕元工業行政中心副協理李路加

而這批空運貨的交貨時間，正好就是四月十四日。在工潮暫緩到四月十四日之後，廠方終於貼出了回應方案，但這個方案並沒有平息工人們的不滿，反而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。原因是這個方案並未提及過去的社保應該如何補繳，而且繳納社保的基點最低仍不是員工的實際收入，與工人的普遍期待仍有差異，

這些傳言進一步加深了工人對工廠與政府的不信任，使得工人的行動逐漸升級，很多工人怕養老保險到退休之時無法兌現，要求企業用現金賠償漏繳的社保金，還有不少工人提出不用政府補繳社保，而是希望工廠買斷自己的工齡，從

此離開裕元（買斷工齡指企業和員工解除勞動合同，企業按照工人工作的年份給予補償，工人工作了多年，便補償多少個月的當下工資）。對於社會保障金之外的現金補償、買斷工齡等方面的要求，廠方則表示難以接受，莊博貴和李路加認為，社保的調整還算是

社保簡介

之基金之保障基金之內容包括養老保險、醫療保險、工傷保險、失業保險、生育保險。按照中國法律規定，企業（單位）和僱員都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繳社會保障金，養老保險部分十五年期滿，員工達到退休年齡之後，便能獲得一定金額的退休金用於養老。社保的繳納比例各地不一，東莞繳納比例為公司11%，員工8%。

裕元工潮勞資分歧

公司沒繳社保？
勞方：「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對賬單」上顯示公司繳納部分為0。

資方：指這是誤會，該對賬單只顯示「個人繳費部分明細」，所以公司繳納部分為0，而「參保人險種繳納明細表」顯示個人和公司部分都有繳納。

社保繳費基準？
勞方：社保繳納基點應按實際工資水平（約3,000元）。指資方目前繳納的基點為1,810元，遠低於實際工資。
資方：按社會平均工資計算，指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法規規定繳費基點。

員工身份？
勞方：指公司一直都將工人列為「臨時工」，擔心影響他們的待遇，以及子女入學等。
資方：政府只將國企職工列為「一般職工」，而私企職工無論層級高低，都被列為「臨時工」，指這純屬記錄形式，與待遇或社保無關。

的振興南路上，進行抗議，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，並有工人受傷。

罷工並沒有向著更極端的方向發展，罷工的激進程度逐漸降低，但是參與的工人卻越來越多，他們不再走上街道，而只是在廠區的門口聚集。「都被打怕了不敢上街了」，楊微說。大規模罷工的第二天，工人們不再上街抗議，而是每天早上按時來到工廠，去

考勤打卡一下便離開工廠，有的在廠外閒坐，大多數則直接回家。而到了傍晚下班的時刻，大批工人們又陸續從各自家裏走出來，回到廠房打卡，接著便離開。「我們就是跟他耗時間，我打卡證明人在這裏，但是就不上班，告訴他們我們還沒有走，不是我們不願意上班，是沒有滿意的答覆」，在裕元工作了十八年、社保還差一年便交滿十五年的戴俊（化名）說，他會一直跟裕元鞋廠耗下去，「我們一天才吃多少

這些遊行沒有統一的組織，也沒有指揮帶頭的人，工人之間的關係是最主要的紐帶，工人間通婚的十分普遍，罷工的人群裏常有手牽手的夫妻，接受亞洲週刊採訪的楊薇、趙紅，都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工作十多年的同事，「我們已經跟親人一樣了」。

QQ群組迅速發布消息

QQ群組是工人間傳播信息的主要渠道，工人間大概有七八個群組，每個群組人數有數百至上千人，上面快速流動著消息、傳聞、照片，每到早上上班的時候，記者所在的「裕元維權總群」QQ群組裏，都有不少工人在號召罷工，類似「一廠的工友們來了麼？」或者「六廠的工友快下來」的言論不斷出現。台灣幹部李路加對QQ群組的號召力和傳播頗為震撼，他說，他也在這些群組裏面觀察言論，但是只要他一發表號召工友冷

向裕元鞋廠浩蕩蕩的上班人群看去，許多的工人都已經是中年人模樣，早期打工的年輕農民工已到了考慮退休的年齡，關於社保的爭議於是也開始在現在這個時段引爆。四月五日，已經有員工發現問題，在老三廠（另有一座新三廠）做流水線管理的雷鳴（化名）介紹，當天有員工給孩子辦理小學入學手續，政府小學回覆他說他是臨時工，不能辦理入學，這一消息讓工人們十分驚訝，並引發了抗議。消息並沒有止於謠傳，不少工人立刻趕去社保局，調取檔案，得到的結果，印證了謠傳，「以前一直沒有查，都以為裕元這麼大的廠，是不會幹出這種事的」，一位女工說。

工人們「證據確鑿」，立刻就通過QQ、微信等組織抗議，四月五日便來到高塘鎮的清水公園進行抗議，參與者雷鳴表示，他們想聯繫記者前來採訪，但是卻沒有記者出現，抗議的橫幅也被警察沒收。抗議兩三個小時後，有工友建議去找政府討說法，示威工人大軍開始向東莞市政府進發。高塘鎮緊挨東莞市中心，之間隔著東江，大橋是二者之間主要的通路，當工人們通過大橋的時候，警察已經嚴陣以待。最終，前去示威的工人被衝散，據在現場的工友雷鳴回憶，這次警察表現得比較克制，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衝突。裕元廠方沒有立刻作出回應，而是向員工們說，到了四

靜、理性的言論，就會被憤怒的網友「踢出」群組，為此，他不得不多註冊幾個QQ賬號。

工人行動溫和化的轉變，一方面是在實踐中得到的結論，另一方面，非政府組織（NGO）的介入，也給工人們帶來一定的指導。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處在首次示威爆發後，便開始和工人取得聯繫，予以指導。工友雷鳴說，在遊行活動遭到警察暴力驅趕之後，春風服務部建議工人們不要上街堵路，要理性抗爭，還建議工人們，既然有理在先可以找政府談，不要給他們以維穩為藉口抓人打人。不過服務社的工作也受到了來自當地公安、國保方面的壓力，服務部人員第一次來東莞後，被公安扣留並遣送回深圳，第二次到東莞不到兩天時間內便和外界失去聯繫。

由於第二週開始工人們不再上街，也不再進行遊行、示威等較為激進的活動，警察和工人的衝突逐漸減少，但是廠區仍然是「重兵把守」，若說是五步一崗、十步一哨並不誇張。裕元鞋廠面積佔地廣大，在高埗鎮西南、東南以及北部各有大片面積的廠區，這些廠區都是自成體系的小社會，超市、宿舍、食堂、操場甚至幼兒園等設施，都集中在這些龐大的區域之內。記者混入廠區，發現各式警車、防爆車，每隔十餘米便有一輛，在廠房門口、涼亭底下、草坪上，到

處坐著原地待命的警察。但是這些警察在大多數時候只是等在那邊待命，並沒有行動。

記者隨著工友混入了工廠，在員工俗稱A B棟的裕元老三廠（耐克廠），數以萬計的員工攥著手裏的員工卡，伴



大批員工打卡後在廠外閒坐；愈工

隨著清脆的打卡提示聲挨個走入廠區。在裕元老三廠，服務工齡超過十五年的超過一千人，而超過十年的，佔到近乎一半以上，多數只要再繳納幾年的社保，就可以滿足退休後領取養老金的條件。也正因為此，事件爆發後，老三廠成為

抗爭最激烈的廠區之一。

雖然廠方一直發布公告，但是由於對補繳社保方案不夠明確，以及員工訴求的升級，始終沒有達成共識。廠方新貼出了兩份公告，指出會「依法辦理補繳」，並「為體恤工友辛勞」，自五月一日起每人每月發給生活津貼二百三十元。現場員工在告示前圍了幾圈，唾罵不斷，五分鐘後，貼在廠區行政樓外的告示被一個員工撕扯下來，扔到了地上。

老三廠內三面建樓，除了靠近廠區門口的辦公樓外，兩個車間大樓並立兩邊，各有六層，每層有三條生產線，共計有員工一萬四千多人。這兩棟龐大的建築裏，每天有超過兩萬雙耐克鞋被各個生產環節的員工製造出來，銷往世界。

即便因罷工潮而閒置多天，生產車間裏仍然撲面而來一股刺鼻的化學藥劑和膠水味。一位員工介紹，生產線長年有如此氣味，且溫度很高，因為鞋子要在最燙的時候放入機器加工鞋底，被風箱燙傷胳膊、被高溫的零部件燙出泡的勞動事件時有發生。

（鞋）底加工」生產線的員工必須挨近坐在一個大風箱旁，風箱平均溫度達到攝氏五六十度。一個員工告訴記者，只要一天工作下來，「內褲都是濕的」。即便在最熱的

夏天，這裏都沒有空調設備。記者在現場看到一個齊人高的老式風扇，似乎是生產間內唯一的降暑工具。「這裏環境真的太差了」，一個員工感慨。

打完卡的工人們並沒有做太多停留，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，熙熙攘攘的工廠又恢復了安靜，工人們紛紛離場回家。廠區設有宿舍，但大多結了婚的工人選擇在工廠周圍租房住，在裕元鞋廠一廠、三廠，所在廠區外圍，已經形



台灣：單傳性言論 仇視資方情緒

成面積同樣龐大的「農民工住宅區」。這些住宅樓多是本地人修建，大多有四五層高，密密麻麻的擠在一起，樓下要麼是骯髒的小巷，要麼是面向工人們的喧鬧的市集。

戴俊便和妻子一家住在其中的一個單位裏，這樣兩室兩廳的單位，月租五六百元，戴俊一家和另外一家合租於此。屋子裝修簡陋，牆面沒有粉刷，地面沒有地板，客廳與廚房合二為一，乍一看，他們彷彿把農村老家裏的家，原樣搬進了城市。

三千元左右，一對夫妻的基本生活便會花去一個人的工資，兩夫妻每年存兩萬塊錢，將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情，而他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很多農村老家還要蓋樓，這一切靠的都是這兩三千元的收入。在老三廠工作七年的劉珍（化名）說，如果沒有這個社保的話，她寧願回去，在家鄉拿兩千塊錢，還可以照顧老人小孩。

抗議的這一代民工，不論是心態還是訴求，已經與老一代十分不同，在東莞開出租車的舒志強（化名）已經快五十歲，他是最早一批來東莞打工的民工，現在早已離開了生產線，「我們那時候哪裏像現在要求這麼高，當時為了一天八塊錢，我們全心全力的給老板幹活，不像現在的年輕人，又要條件好，又會經常換（廠子）」。

人口紅利削減影響外資

舒志強屬於中國「人口紅利」的一代人，但是在勞動成本上漲、維權意識增強的形勢下，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不斷削減，王松江分析，這將導致外商資本流向成本更低的國家，可能造成大量的失業農民工滯留城市。莊博貴說，他們也意識到了東莞勞動成本的上升，公司本想將東莞各廠產業升級，專注高端鞋製造與研發，但是在發生工潮以及如此多的「誤解」之後，「我們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情形」。（註：工人姓名皆為化名）

這兩年，春風社共介入三十起珠三角地區的工人罷工事件

春風社帶來工人維權春風

民間獨立勞工組織春風服務社因推動勞資談判，被東莞市政府監控近十天，仍深入廠區與五十多位工友商討維權事宜，確定罷工訴求和行動方案，但負責人傳被國保控制，對外失聯。

· 馬倩



■ 裕元鞋業廠區罷工場面：燎原之勢

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時左右，傳來消息稱，深圳春風服務社負責人張治儒及其同事林東與外界失聯。從當天下午開始，兩人的電話均已無法接通，就連個人微信也被遮

罩。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的王江松教授在其個人微博中透露，晚上十時半左右，張治儒的夫人傳來消息，「老張上午出去時候，說去見東莞國保，現在還沒有回來，電話也打不通

路透社

了，失去聯繫。他的助手林東也同時失聯。原因應該是春風指導裕元鞋廠工人理性地有組織地維權」。一個多小時後，王江松再發微博表示，已基本確定，張治儒和林東被軟禁在東莞的某山莊賓館內。

前一天晚八時左右，「裕元鞋廠維權援助小組」一行十餘人，包括張治儒、林東、廣東勞

維律師事務陳輝海等到達東莞市高埗鎮，分批次與裕元一廠、新老三廠、六廠、八廠、加元廠的約五十多位工友會面，商討維權方案。經過六個多小時的商討，兩方最終確定了罷工工人的利益訴求和行動方案。

這是春風服務社第二次冒險進入高埗。由於擔心持續兩週多的罷工行動因為缺少組織和秩序被擊破，也為了推動勞資雙方日後能夠通過集體談判解決爭端，即使已經被東莞市政府監控近十天，張治儒還是帶領「裕元鞋廠維權援助小組」深入裕元鞋廠，並呼籲廠方如果不讓步，工人就堅持不復工。

春風服務社開始介入裕元鞋廠工人罷工事件是在四月十二日。午夜過後，張治儒剛剛



結束一場全天無間斷的網絡對話。這是東莞裕元鞋廠工人罷工的第七天。這一天，他同時和裕元的六個工人QQ群裏的工友們進行了溝通，近千位工友圍觀。要通過網絡會話了解工廠的違規行為以及工友們的真實想法，並非易事。

伏硬
制強怒
方：強怒
警者：強怒
抗議手段

在大範圍的交流之前，張治儒先是和各個群組的管理員溝通，以為春風服務社博取工人們的初步信任。

開始時不獲工人信任

「開始介入的時候，大部分人不信任春風社，有人甚至說我們是政府的人」，張治儒

說，「我的個人資料在網上都是公開的。而且我把自己的身份證、工作證等證件的照片，還有一些生活照都發到了QQ群裏，然後爭取和一些工人視

根據張治儒的助理林東的介紹，自二零一三年起至今，春風服務社總共介入了三十起發生在珠三角地區的工人罷工事件。

為了向工人們展示如何通過集體行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，張治儒把春風過去協助其他工人與資方開展集體談判的對話記錄，複製到QQ群裏。這以後，主動向他諮詢的工人就多了起來。

第一階段的交流結束後，張治儒立即把這一天和工友的交流溝通做了一個系統的歸納整理，寫出《給裕元鞋廠工友們的第一封公開信》。他在信中指出，工人們對於如何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，並沒

有統一意見，因為「工友之間缺乏有效溝通和了解，很自然會對不熟悉的人產生各種各樣不確定的想法」。對此，他提出五條建議，包括「確立廣泛全面訴求」，形成「統一有效的行動指揮體系」，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的邀約等。

這以後不斷有工友向他們諮詢。於是，張治儒便和其中幾位約定，十三日晚在位於高埗的鞋廠附近見面，「（雙方）做個初步接觸」。然而，

第一次會面因警方介入而以失敗告終。當晚八時左右，張治儒和林東、簡輝兩位同事以及

春風的志願者張科到達高埗。他們在鞋廠旁的一個餐廳坐下，還不到五分鐘，就被當地公安帶回了派出所，直至第二日清晨四時才被返回深圳。

「當時餐廳人很多，我們剛進去，就有警察進來挨桌盤問外面的車是誰的。我們沒承認車是我們的，他們就問我們是不是從深圳來的。」林東回憶道：「我們說是，之後就讓他們回派出所接受調查了。」

林東說，他們預料到可能這次去東莞不會很順利，但沒想到這麼快就被控制住了。雖然整個過程中警察對他們的態度比較溫和，但仍

明確要求春風不要參與裕元鞋廠的罷工事件。據張治儒回憶，他們還被告

誡不要鼓勵工人維權，理由是一以防

工人出現不理性的行為」。儘管春風

服務社在四月十二日才介入此次罷工

事件，但警察盤問

的核心是，春風是否參與了四月五日

發生的工人罷工堵

路事件，「他們懷疑是我們指使工人

做的，來來回回問的都是這個」。盤

問持續了大約兩小時，但直至十四日

清晨四點他們才走出派出所，且被兩

輛警車一路「護



警察與警犬登場面對罷工：威嚇



裕元鞋業生活區：維權深入人心

說，「很多農民工家裏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如果抓進去一關半個月，就擔心家裏的老人受不了」。考慮到工人們的顧慮，張治儒提出委託第三方代表工人和廠方談判的建議。第三方是指勞工公益機構人士或勞工公益律師及談判專家。目前，春風服務社已經牽頭成立「裕元鞋廠工人集體維權援助小組」，由勞工維權機構負責人、勞工公益律師、工人集體談判專家和勞動法教授等數十人組成。不過，援助小組要正式介入集

體談判，就必須有工人的書面委託授權，否則小組沒有法律依託，將面臨法律風險。

四月二十日下午二時至當晚十一時，春風服務社再次就公開信的建議，與九十名工人通過QQ群舉行網絡會議，商

討選舉工人代表及委託授權事宜。會議的初步目標是，首先選出一個由二十人組成的「裕元鞋廠集體維權行動委員會」，負責指揮、協調裕元鞋

廠集體維權行動。由於鞋廠規模大，工人人數多，因此還計劃在每一個分廠設立一個由五

至十人組成的「維權小組」，

由小組發動並負責組織選舉各個分廠的行動領導，「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框架來引導工人理性、依法維權，避免再出現罷工初期的工人堵路、人身攻擊等非理性行為」，張治儒說。

在推動這一目標實現的過程中，春風服務社面臨的最大

困難是，由於東莞市政府的監控，服務社無法與工人們面對

面交流，因此在試圖達成共識

的時候，效率比較低。張治儒

還表示，雖然此前通過網絡交流取得了工人們的初步信任，

但是由於缺乏面對面的溝通，

這種信任關係還不夠牢固。比



致工友的公開信：呼籲罷工組織化、公開化

送」至東莞高速公路。

被捕後始獲工人信任

此後直至二十一號，春風服務社只能通過QQ群和工友聯繫。而他們被拘留並遣返的經歷，也在群內流傳開來，使

工人對其信任度加深。「工人聽說後都感到很激憤，之前對

我們的顧慮也逐漸消失了。」

林東說。「如果有媒體想採訪工人，工人有顧忌的話，我們

會（進行）勸說和開導，他們才會同意採訪。」

張治儒擔心，工人們的無序行動可能被有關部門瓦解。

他解釋說：「因為這些天的罷工沒有統一的組織和統一的領

導，參與罷工的幾萬人也沒有統一的訴求，行動很容易被各個擊破或被利用。」

於是，他在十八日再次

向工人們發出一封公開信，

呼籲他們將罷工行動組織

化、公開化，

同時提出勞資雙方集體談判

的解決方案。他建議工友利

用接下來的雙休日成立各個

廠的「維權領導小組」或



東莞：裕元鞋業工人在廠外租住的房子

希望政府能以開放的心態去接納他們的機構。當前，民間維權機構的生存空間非常逼仄，政府常常通過各種手段來打壓。據王江松的觀察，「逼遷」是最常見的方法，即上級部門向房東施壓，房東寧可賠錢，也要毀約，停止將辦公室租給特定的維權機構。其他手段還包括，通過工商稅務部門、消防部門來找碴，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對機構進行罰款。

此外，由於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，這些民間組織始終

做不大。被問及原因

時，王江松說：「政府誤以為他們

是受境外勢力操縱的，

要搞非法工會組織，對

官方工會構成挑戰的，我認為這是誤判。」

當下，中國的維權人士普遍遭到政府的壓制或起訴。對

一般的維權人士，警方通常會採取行政拘留，要求活躍人士

寫悔過書，並保證日後不再參與維權活動，就會被釋放。而

是擾亂社會治安或交通秩序。王江松認為，工人代表、工人

組織得不到法律保護，是維權勞工面對的最大威脅。

王江松還說，打壓維權行動的做法只是「表面上熄火，但實際上並未真正解決問題。因為事實表明，各地罷工運動此起彼伏，不斷出現」。而一味壓制也很容易引發無組織、爆發式的罷工運動。

「這種無序的罷工可能會引發意料不到的後果，比如打砸搶之類的非理性行為。因為它沒有領導，無法控制，沒有和資方、政府對話的組織，也沒有對話的渠道和空間。」